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2.007

重访“斯诺命题”:论麦克尤恩 《星期六》中的两种文化

尚必武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 麦克尤恩的《星期六》被批评界普遍定性为“9·11小说”,但“9·11”事件及其喻指的“政治”命题绝非小说的终极旨趣。在更深层次上,《星期六》暗藏的是“两种文化”即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所代表的科学与诗人黛西所代表的文学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借助小说,麦克尤恩喻指了“两种文化”在排他性背后的互补可能,即科学之于人的肉体犹如文学之于人的精神,二者须臾不可分离,由此为横亘在两大学科之间的“斯诺命题”作出了自己的注解。

关键词: 麦克尤恩;斯诺;《星期六》;两种文化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0)02-0036-08

2011年9月5日,英国政治文化权威期刊《新政治家》向读者集中推荐了11部“9·11小说”,引发广泛关注。入选的除洛兰·亚当斯(Lorraine Adams)的《港口》(*Harbor*, 2004)、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坠落的人》(*Falling Man*, 2007)、乔纳森·萨弗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的《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2005)、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l)的《地之国》(*Netherlands*, 2008)、詹姆斯·海因斯(James Hynes)的《下一个》(*Next*, 2010)、泰如·科尔(Teju Cole)的《开放的城市》(*Open City*, 2011)、艾米·瓦尔德曼(Amy Waldman)的《服从》(*The Submission*, 2011)等作品外,还包括英国知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星期六》(*Saturday*, 2005)。同《新政治家》杂志的做法如出一辙,一段时间以来,批

评界普遍把《星期六》视作一部“9·11”小说。譬如,罗贝卡·卡彭特(Rebecca Carpenter)认为:“《星期六》充满了对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的指涉和回响。”^①安德鲁·弗雷(Andrew Foley)称它是“对后9·11文学最严肃的贡献之一”^②。

需要指出的是,“‘9·11’小说”的标签遮蔽了《星期六》所潜藏的多种意蕴。欣喜的是,这一状况在近期有所扭转。譬如,苏珊·格林(Susan Green)从认知科学角度将这部小说视为“元文本”(meta-text),邀请读者反思科学与艺术之于理解人物心理的互补作用^③。简·思雷基尔(Jane F. Thrailkill)借助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重点审视了麦克尤恩如何在这部作品中通过聚焦“意识的精神生物学”(neurobiology of consciousness)为人类介入叙事增加了特殊的情

收稿日期:2019-1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WW039)

作者简介:尚必武(1979-),男,安徽六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叙事学、文学伦理学、英美文学研究。

^①Carpenter, Rebecca. “‘We’re Not a Friggin’s Girl Band.’: September 11, Masculinity, and the 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hip in David Hare’s *Stuff Happens* and Ian McEwan’s *Saturday*”. *Literature After 9·11*. Eds. Ann Keniston and Jeanne Follansbee Quin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151.

^②Foley, Andrew. “Liberalism in the New Millennium: Ian McEwan’s *Saturday*”. *JLS/TLW*, 2010, 26(1): 135.

^③Green, Susan. “Consciousness and Ian McEwan’s *Saturday*: ‘What Henry Knows’”. *English Studies*, 2010, 91(1): 58-73.

感因素^①。马可·卡拉乔洛(Marco Caracciolo)重点考察了该小说的内聚焦和现象学隐喻,试图由此分析读者对小说人物经历的感受^②。劳拉·科隆比诺(Laura Colombino)把身体作为城市和全球的外部空间隐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星期六》中的灾难空间^③。国内学者宋艳芳分析了《星期六》中所体现的小说作为“文化话语”“伦理范式”“预言方式”和“主观模式”等方面的功能^④。耿潇把《星期六》看作是一部城市哥特小说,表达了作者麦克尤恩对当前世界时事、文化及英国社会的看法^⑤。刘春芳认为该作品通过描述西方当代都市的文化生态,凸显了当代都市生活中的毁灭感与灾难感^⑥。

上述论者对《星期六》的多维阐释,富有创见,令人深受启发。然而,笔者认为在更深层次上,《星期六》暗藏的是“两种文化”即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所代表的科学与诗人黛西所代表的文学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本文在批判“后9·11”语境下的“政治书写”的基础上,重点审视了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碰撞与鸣奏。一方面,女儿黛西试图通过向父亲贝罗安布置阅读书单,来丰富和侵占父亲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后者则对文学的功用嗤之以鼻,坚持以科学来解释和控制物理世界。通过诵读阿诺德的名篇诗作《多佛海滩》,黛西成功地掌控了暴力侵犯者巴克斯特的精神和心智,消除了家庭危机;凭借精湛的医术,贝罗安摘除了巴克斯特的颅内肿瘤,解决了他的肉体之疼,而且还决定说服家人和警察放弃对巴克斯特的诉讼。借助小说,麦克尤恩喻指了“两种文化”在排他性背后的互补可能,即科学之于人的肉体犹如文学之于人的精神,二者须臾不可分离,由此为横亘在两大学科之间的“斯诺命题”作出注解。

一 “9·11”文学类作品的重申与超越

克里斯蒂娜·鲁特(Christina Root)曾说:“从很多方面来说,《星期六》就是一部现实主义叙事作品,把一天再现为当代西方的某个动乱时刻,把亨利·贝罗安再现为后‘9·11’时代世界的每个人。”^⑦鲁特的言论绝非个案。长期以来,《星期六》被学界普遍定性为“9·11小说”,就连作者麦克尤恩本人都这么认为。在接受《出版周刊》的采访时,麦氏坦言:《星期六》“确实源自9·11事件,是在长时间、大范围倾听和观看人们对这一事件作出评论的结果”^⑧。

在某种程度上,《星期六》再现了“9·11事件”对当代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与介入。“9·11事件”之后,小说主要人物贝罗安、西奥、黛西都对政治、反恐、战争等有了更多的关注。“9·11事件”是西奥关注的第一件国际大事。黛西原本很少讨论政治,不关心政治,但她从巴黎回来之后,同父亲贝罗安一见面就谈论伊拉克战争、反恐等,争论得不可开交。贝罗安原本在家里把香槟酒放进冰箱,准备去打开CD音乐,但此时他却改变了主意,开始破天荒地在这一天关注电视、关注媒体对政治的报道,尤其是特别想知道电视新闻是否会报道他在凌晨所看到的飞机失事这一事件。贝罗安这样解释自己的心态:

这是当今世界的状况让他养成的习惯,总是不可抑制地想要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想要和其他人一道关注变化,与天下同忧。这个习惯在近两年变得更加强烈;有资格被载入新闻的惊天大事。每一天都分享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每天都有可能重现9·11这

^①Thraikill, Jane F. “Ian McEwan’s Neurological Novel”. *Poetics Today*, 2011, 32(1): 171-201.

^②Caracciolo, Marco. “Phenomenological Metaphors in Readers’ Engagement with Characters: The Case of Ian McEwan’s *Saturda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3, 22(1): 60-76.

^③Colombino, Laura. “The Body, the City, the Global: Spaces of Catastrophe in Ian McEwan’s *Saturday*”. *Textual Practice*, 2017, 31(4): 783-803.

^④宋艳芳:《小说何为?——从麦克尤恩的〈星期六〉看小说的功能》,《国外文学》2013年第3期。

^⑤耿潇:《〈星期六〉的哥特文类属性研究》,《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3期。

^⑥刘春芳:《〈星期六〉中的当代都市文化逻辑》,《外国文学》2016年第6期。

^⑦Root, Christina. “A Melodiousness at Odds with Pessimism: Ian McEwan’s *Saturda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011, 35(1): 60-78.

^⑧Rosenheim, Andrew. “The Voice of Modern British Fiction”. *Publishers Weekly*, 28 February 2005: S16.

样的惨剧。政府的预警——针对欧美某个城市的恐怖主义袭击是不可避免的——这绝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严肃的预言。人人都在恐慌不安,但其实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共同的更加黑暗的欲望,那就是对自我惩罚的厌倦和亵渎神明的好奇。例如医院已经制定了急救计划,媒体也做好紧急报道的准备,观众更是翘首以待。下次恐怖袭击的规模肯定更大、破坏力也会更强,上帝保佑不要让它发生。但如果一定要发生的话,可千万别让我错过观看。最好还是现场直播,全景拍摄,让我在第一时间就能了解情况。”^①

在“9·11事件”发生之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经意间与反恐连为一起,时刻担心却又期待下一个恐怖事件的来临,生怕自己错过下一场恐怖主义袭击。人们对时事的关心似乎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就此而言,贝罗安的反常表现映射了后9·11时代,人们对于恐怖主义袭击的妄想。贝罗安绷紧神经,密切关注时事。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贝罗安对于飞机失事并不是恐怖活动这一结果并没有感到释然和放松,似乎还因为自己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而略感失望。小说写到:“贝罗安并没有感到特别的高兴,甚至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是他被自己的忧虑愚弄了吗?这就是所谓的新生活秩序所造成的后果,限制了他精神的自由,剥夺他猜测的权利。”对于飞机失事这一事件,西奥和父亲的下述对话更是充分反映了“9·11事件”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西奥问道:“你猜是不是恐怖分子?”

“这是一种可能”。

9·11事件是西奥关注第一件国际大事,也是他头一次承认这世上除了朋友、家庭和音乐之外还有其他事情也可以影响到他的存在。

无论是贝罗安、西奥、黛西都对政治、反恐关

注有加,而作为一种“记忆的表演”,“9·11事件”在媒体宣传中被不断地强化和刷新。

如果说贝罗安最开始的失眠,或许是因为女儿即将回来,心中带着一丝兴奋与激动,那么他的这份激动与不安渐渐让位于他对飞机失火事件的关注与媒体后续关于恐怖袭击报道的期待。综上,学界给《星期六》贴上“9·11小说”的标签,似乎并不为过,但“9·11事件”及其喻指的“政治”命题绝非小说的终极旨趣。作品的主体内容并不是描述这架失事的飞机,而是聚焦于贝罗安及其女儿在文学阅读上的不同态度。学界也似乎忽略了笃信科学的贝罗安为世间所有一切寻找科学解释的努力。贝罗安坚信物质、信仰科学,想当然地认为医学所代表的科学可以解释世间一切、拯救一切。在应对巴克斯特暴力入侵危机时,黛西的文学感化方式深深地触动了贝罗安的心灵,让其惊叹文学的力量,引发对于文学何为的认识与思考。在这种意义上说,麦克尤恩在《星期六》所要探讨的则是深层次的科学与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间接回应了半个世纪以来学界争论不休的“斯诺”命题。

二 两种文化的碰撞

1959年5月7日,兼有化学家和小说家双重身份的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演讲。在演讲中,斯诺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互有敌意的两级:文学家和科学家。他说:“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②让人费解的是,“科学家和文学家这两个集团之间很少交往。非但没有相互同情,还颇有一些敌意”^③。对于两种文化的态度,斯诺的观点是要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在他看

①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夏欣茁译,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②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页。

③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8页。

来,“弥合文化中的鸿沟不仅从最现实的方面看是必要的,从抽象的精神方面看也是一样。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任何社会都不能明智地考虑问题”^①。

斯诺认为:“科学进程有两种动机:一是为了理解自然界,二是为了控制自然界。对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无论哪一种动机都会成为主导的;科学战斗往往从这一种或那一种动机中获得最初的动力。例如,宇宙学研究宇宙的起源和本质——这是第一种动机的恰如其分的典型事例。医学则是第二类的典型表现。”^②在《星期六》中,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正是斯诺口中的那类试图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科学家的典型代表。他自命不凡,笃信科学的力量,为世间所有的一切寻找科学解释,同时又厌恶文学。譬如,在星期六凌晨,贝罗安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失眠。凌晨3点多钟,他下床后走向窗边,打量窗外的世界。对于自己的失眠,贝罗安并没有感到意外和惊讶,而是为此寻找科学的解释。他认为:“或许在他熟睡的时候,体内的分子发生了化学事故,如同被打翻了的饮料托盘,促使多巴胺似的受体在细胞内激起一股强烈的反应;不然就是星期六的来临,或者是过度的劳累产生了物极必反的效应,才导致了这种兴奋。”

兰迪·费泰尔(Randy Fertel)曾精辟地指出:《星期六》再现了贝罗安“几乎全部致力于理性和分析型的左脑思维”与其右脑“后退”之间的冲突^③。在小说中,费泰尔所说的贝罗安的左脑思维和右脑思维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他对科学与文学的两种不同态度上。与笃信科学的态度相左,贝罗安对文学多有鄙夷。小说写道:“下班回来时家里空无一人,他索性躺在浴缸中读书,满足于这种沉默。他正在读一本达尔文传记,是他过度爱好文学的女儿黛西送给他的。说是和她希望他接下来该读的康拉德的小说有关,他还不知道何年何月会去碰那本书——因为航海的题材,无论多么富含哲理,实在难以勾起他的兴趣。几年

来她常常批评他的无知已经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于是引导他接受文学教育。”一方面,贝罗安固然是忙于医学培训、钻研医术,另一方面还在于“他自认为所目睹过的死亡、恐惧、勇气和苦难已足以充实多部文学作品”。换言之,贝罗安没有阅读文学作品的真实原因在于认为自己的实际工作要远远丰富于文学阅读,但他毕竟开始接受女儿的建议,试图完成她布置的阅读书单,因为他深知这是他和远在巴黎读书的女儿之间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尽管贝罗安不喜欢阅读文学,但是他又脱离不开文学这根沟通自己和女儿的纽带。对于女儿布置的书单,贝罗安不仅是远远滞后,而且在阅读的时候,无论他多么试图进入阅读状态,都根本提不起精神。小说写道:“当他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读进去的时候,就关掉了收音机,又回到书本上重新再来。”与读书时的走神和无精打采的状态相反,贝罗安陶醉于自己做神经外科手术时的精准迅捷、游刃有余:“凭借周密的安排再加上分身有术,他得以在一间手术室里实施大型手术,同时督导另外一间手术室里的一名高级实习医师,还兼在第三间手术室进行一些小型手术。”对于自己精湛的医术,贝罗安感到无比的自豪。在一次手术后,他感慨道:“三年的痛苦,所有尖锐的、刺骨的疼痛,都彻底结束了。”小说这样描述贝罗安对工作的热情:“手术不会令他感觉到疲倦——一旦他沉浸在医院、手术室和井然有序的手术程序所组成的封闭世界里,全神贯注地沿着从手术显微镜里所窥探到的生动的路径直到抵达患病的部位,每当这种时候他便会迸发出超人的能力,更像是一种渴望,对工作的极度渴望。”

就其事业而言,贝罗安相当成功。“贝罗安向来以高效率和高成功率而著称,等候接受他治疗的名单长得出名——每年他要实施的手术超过三百例。有的没能转危为安,有的还处于危险期,但大多数恢复了健康,很多人重回了工作岗位,还是工作——是否能够工作已经成了健康的象征。”贝罗安可以同时控制几个手术室、成功摘除

①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6页。

②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4页。

③Fertel, Randy. "Saturn vs. Hermes: The Battle of the Hemispheres in Ian McEwan's *Saturda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016, 39 (2): 55.

脑瘤,让他有主宰世界、控制世界的欲望和成就感。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贝罗安作为神经外科医生被介绍给英国首相布莱尔,但是布莱尔则将他误认为是艺术家。首相在无形中混淆了他的职业身份:明明是笃信科学的医生却被误认为是艺术家。

在女儿黛西的鼓励下,贝罗安试着读了“一个有关一个小女孩经历父母不负责任的离婚的悲惨故事。听起来应该会有点意思,但可怜的小主人公梅齐的形象很快就被淹没在一堆文字当中,才看了四十八页,贝罗安却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可以承受一连七个小时站着做手术,也具备足够的体力去参加伦敦马拉松赛跑,但是却忍耐不了读书的辛苦”。对于文学,贝罗安有很多困惑与不解。譬如:“有本书的女主角甚至和他的女儿同名,这本书也同样令他困惑不解。作为一个成年人对黛西米勒那注定的堕落还能得出什么其他的结论?难道说他由此意识到了世界的残酷?这还远远不够。贝罗安弯下腰来,凑近水龙头,开始洗脸。也许他,至少在这一点上,开始像达尔文晚年时一样,对莎士比亚这类作家的厌烦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遗憾的是,无论贝罗安多么努力,“他似乎对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缺乏耐心。只有工作让他专心致志;对工作之外的事情,他都很不耐烦”。事实上,贝罗安一直不喜欢阅读文学。他除了医学图书之外,似乎没有看过任何其他读物,对阅读诗歌尤其缺乏耐心。贝罗安这样评价对于诗歌这一重要的文学样式:“但是诗歌就不一样了,未来体现对现实的触觉和评论,诗人总是驻足在此时此刻的一点上,让读者和时间一起停滞不前,阅读和欣赏诗歌就如同学习一门古老的手艺一样复杂。”让贝罗安大跌眼镜的是,不仅他的岳父约翰是一名诗人,而且女儿黛西长大后也成了一名诗人。无论贝罗安是多么尊敬岳父、疼爱女儿,但他丝毫没有喜欢上他们所从事的诗歌。小说这样描述贝罗安阅读诗歌的状态:“自成年以来就对诗歌毫无兴趣的贝罗安从来没听说过这些诗,就算是娶了诗人的女儿之后也是一样。但是自打他发

现自己将成为一位未来诗人的父亲的时候,他便开始有所涉猎。为此他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通常刚看到诗的第一行他的双眼就有种疲倦的冲动。”之于介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贝罗安,笔者赞同汉娜·考特尼(Hannah Courtney)的观点:“贝罗安是(或许过于表现是)一个‘科学男’(science man)而不是‘艺术男’(arts man)——他相信固定的事实而不是阐释。”^①

与父亲贝罗安截然不同,黛西自幼就有很高的文学情操。她十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能背出数十首诗歌。13岁的时候,黛西在外公约翰的启蒙下,开始阅读《简·爱》。小说这样描述黛西对文学的挚爱和沉迷:“读到一百页的时候,黛西开始被简深深地吸引住了,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天下午全家人要到田野中去散步,唯独她不肯同去,因为她还有四十一页没有看完。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黛西正在树下的鸽舍旁哭泣,不是为了情节本身,而是因为当故事落幕的时候,她也从一场梦中醒来,才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作家虚构出来的。她流泪时出于崇拜,感叹竟然有人能够创造出如此动人的故事。”大学时代,黛西曾经就亨利·詹姆斯的几部后期作品撰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甚至能背诵出《金碗》中的个别篇章。成年后的黛西正在筹划出版一部诗集。她特别强调的是,发行诗集的并不是那些发行量极少的出版商,而是“位于女王广场的一家享有盛名的出版公司来负责”。比这个更让她高兴的是,她的诗歌还引起了其文学启蒙老师外公约翰的注意。小说写道:“甚至她那目空一切的外公,原本对现代诗歌深恶痛绝的,也从他住的城堡发来了一封几乎无法辨认的书信,经过仔细研究才发现内容居然是欣喜若狂的。”

贝罗安以阅读物理学教材的方式来阅读文学作品。这无疑遭到黛西批驳:“你真是麻木”,“你就像格莱恩一样顽固不灵,这是文学著作,不是物理学教材。”在黛西看来,正是因为父亲没有文学阅读的习惯,所以才导致了他无知得让人惊诧。她不断批评父亲糟糕的品味和敏感性的匮乏。与

^①Courtney, Hannah. "Distended Moments in the Neuronarrative: Character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in Ian McEwan's *Saturday*". *Mindful Aesthetics: Literature and Sciences of Mind*. Eds. Chris Danta and Helen Groth. London: Bloomsbury, 2014, p. 175.

弟弟西奥不同的是,黛西喜欢和父亲起冲突。“父女两个都喜欢激烈的对抗。”这种对抗突出表现在他们对文学阅读的不同态度和判断。比如,对于《安娜·卡列妮娜》和《包法利夫人》这两部作品,贝罗安的阅读感受是:“为消化那错综复杂的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的思维变得迟钝,还浪费了她无数个小时的宝贵时间。那么他学到什么道理呢?无非通奸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错误的。”在隐喻意义上,他们之间的冲突可以被视为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此,考特尼持有相似观点:“贝罗安大脑里属于决定论和自有个体选择的争论贯穿整个文本,它再现了科学理念与文学理念这一更大的争论。”

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不仅表现在贝罗安和其女儿黛西,而且还表现在贝罗安和其岳父约翰之间。小说写到:“两个男人保持着表面上的友好,但其实暗中都厌恶对方。贝罗安无法理解——诗歌这种东西看上去都是一时兴起而做的事情,就像偶尔去摘葡萄玩——居然也可以成为一种职业,还能为某些人赢得名利和自我的膨胀,不过是几首小诗而已。贝罗安也看不出写诗的酒鬼和普通的酒鬼有什么差别;而在约翰看来——这只是贝罗安的猜想——这个女婿充其量只是一个高级技工,一个没有文化而且乏味的大夫。”如果说斯诺重点讨论了两种文学之间的冲突,那么麦克尤恩重点探讨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或许在这种意义上,莫莉·克拉克·西拉德(Molly Clark Hillard)说,《星期六》是“一部需要重读再重读的小说”^①。

三 两种文化的融合

对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碰撞,最为明显的是他们面对流氓巴克斯特的态度及其处理方式。正是在巴克斯特事件上,贝罗安一家人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化达成了和解。在贝罗安开车去打球的路上,遇到了以巴克斯特为首的三个流氓。如何才能解除即将被流氓敲诈的危机?贝罗安试图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使自己摆脱困境。“贝罗安的注意力,出于职业的关注,再一次落在巴克斯特的右

手上。那不是一种简单的颤抖;这种无休止显示每一寸肌肉都有同样的症状。诊断这只手的过程让贝罗安感到轻松。”即便是在挨了一拳的时候,贝罗安依然为巴克斯特的抖动症寻找解释,将其诊断为亨廷顿式舞蹈症。贝罗安开始用自己的诊断结果来威胁巴克斯特,直接对他说:“你父亲有过这个病,现在你也染上了。”通过告诉巴克斯特他的病情有被治愈的可能,让其在同伴面前出丑,贝罗安成功解除了危机,但他的欢欣未免为时过早。

为了迎接女儿黛西的归来,贝罗安特意安排了家庭聚会,而其另外一重意图是为了修补约翰与黛西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和解。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同为诗人的约翰与黛西之间是同一种文化的内部矛盾,那么代表另一种文化的贝罗安与他们的矛盾才是主导性的。凑巧的是,聚会和暴力入侵事件不仅成为家庭重修旧好的契机,也是“两种文化”最终得以和解的动因。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期待暴力恐怖事件的贝罗安没有料想到,他所期待实现的恐怖事件竟然发生在自己家里,而且妻子罗莎琳被歹徒挟持,岳父被歹徒打断了鼻子。

对于这场危机,贝罗安首先采取的步骤是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来解释巴克斯特的行为。其次,他试图用医学知识来控制当前的被动局面。贝罗安告诉巴克斯特,他的疾病是有药可治的:“我在今天早晨遇见你之后,联系了一个同事。美国有套新的治疗方案,并且研制出一种新药搭配治疗,这种药现在还没有上市,但已经在英国开始试用了。在芝加哥取得的初步效果很喜人。百分之八十多的病人症状都有所缓解。他们下个月将在这里挑选二十五个病人进行实验性治疗。我可以把你列到实验名单上。”贝罗安的本意在于试图通过自己的医学知识,继续编造出治愈其疾病的方法来控制巴克斯特,让他在同伴面前出丑,瓦解他们的阵营,使他们自行退去。殊不知,这些街道上的小混混非常在意自己的面子,巴克斯特开始将手中的刀更加逼近罗莎琳,以至于后来直接威胁

^①Hillard, Molly Clark. “‘When Desert Armies Stand Ready to Fight’: Re-Reading McEwan’s *Saturday* and Arnold’s ‘Dover Beach’”. *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2018, 6(1): 183.

女儿黛西脱去衣服。可以说,贝罗安试图通过医学来控制巴克斯特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得局势愈加恶化。

贝罗安对于巴克斯特的病症的判断是,“一个小小的遗传变异,一个生命密码的意外重复,决定了他命运多舛,但他绝不能就此放弃——这一点贝罗安同样坚信”。在这句话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贝罗安利用遗传、基因这些科学元素来解释巴克斯特的病症及其后果,同时却又变得“情感化”(emotional),他在意念中相信巴克斯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但这种信仰显然不能通过科学来解释。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巴克斯特对摆在桌子上的黛西新出版的诗集的兴趣,让她朗诵出其中的一首。黛西朗诵了阿诺德的《多佛海滩》,结果被巴克斯特误认为是自己写的,他像孩子一样兴奋和激动,放过了黛西,让她重新穿上衣服,宣称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要那本诗集。精力分散后的巴克斯特在贝罗安和西奥的联手下,摔下楼梯,被最终赶过来的警察所俘获。作为知名的文化批评家,阿诺德在《多佛海滩》中借助“潮战”意象来探讨文化命题,传递出对文化信仰的积极态度。在该诗歌所描述的“潮涨潮落的节奏中,我们可以听到对如下文化命题的追问: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幸福?什么叫有质量的生活?”^①麦克尤恩在作品中通过别出心裁地借用阿诺德的《多佛海滩》,“戏剧化地处理了他在小说中给诗歌和科学之间所设立的差异”^②。

实际上,这场家庭暴力入侵危机的解决,不仅带来了科学与文学之间冲突的和解,而且也使得黛西与约翰这两位文学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和解了。当贝罗安说阿诺德的《多佛海滩》就如岳父约翰的那首《富士山脉》一样家喻户晓的时候,约翰非常兴奋,提议大家喝酒庆祝。确实,经过这场危机之后,黛西与外公约翰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和解。约翰提议为黛西干杯,“黛西吻了外公,外公拥抱了她——两个人终于冰释前嫌,纽迪盖奖的

风波就此告终。”不仅文学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解决了,而且横亘在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冲突也似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尽管自己个人遭受过巴克斯特的肢体侵犯、自己的家人也遭受到巴克斯特的伤害,但是贝罗安还是去往医院,对巴克斯特做外科神经手术,并且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一定要先说服罗莎琳、接着是其他家人,还有警察,一起放弃对巴克斯特的起诉。”在法律意义上,贝罗安的这一做法似乎有包庇犯罪之嫌,但是这种包庇的背后,凸显了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如果说之前黛西想要用文学来浸润和改变贝罗安的努力都没有成功的话,那么她的诗歌朗诵,不仅让巴克斯特中了“魔咒”,而且也让贝罗安见证了文学艺术的魅力,对文学、对诗歌产生了“顿悟”。贝罗安终于有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他用文学而不是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巴克斯特的改变:“一个十九世纪的诗人——贝罗安至今还未搞清楚他究竟是大名鼎鼎还是默默无闻——竟然勾起了巴克斯特自己都无法描绘的渴望。他渴望能够活下去,像正常人一样,生命之珍贵在于它的短暂。”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约翰尼斯·沃利(Johannes Wally)评论说,《星期六》“庆祝神经科学和文学,可被看作是对科学与温和的社会功能的复杂的伦理投射”^③。

实际上,贝罗安一家本身就是科技与人文的结合。这在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身份上也可以窥见一斑:丈夫贝罗安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儿子西奥是一名蓝调音乐人,女儿黛西是一名诗人,黛西的男友则是一名考古学家,岳父约翰是一位著名诗人,妻子罗莎琳是一名报业律师。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存有一定程度的分歧,但一家人始终不离不弃。面对逆境时,全家人齐心协力,最后成功解除了家庭危机。消除误解之后的他们变得更为和谐、融洽和幸福。这似乎也有“两种文化”无可分割的寓意。笃信科学的贝罗安最终领悟到文学的惊人力量,成为有心智敏感性的人物。贝罗安凭

^①殷企平:《夜尽了,昼将至:〈多佛海滩〉的文化命题》,《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②Rees-Jones, Deryn. “Fact and Artefact: Poetry, Science, and a Few Thoughts on Ian McEwan’s *Saturday*”.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 2005, 30(4): 336.

^③Wally, Johannes. “Ian McEwan’s *Saturday* as a New Atheist Novel? A Claim Revisited”. *Anglia*, 2012, 130(1): 106.

借精湛的医术,清除了巴克斯特的颅内淤血,解决了他的肉体之疼。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为巴克斯特的求生欲望所动容,决定说服家人和警察放弃对他的诉讼。

四 结语

三十年前,曾乐先生在论及“两种文化”时,指出:“‘两种文化’的弥合,人类精神的重整,政治决策过程的民主化,根本上维系于多一点宽容精神,多一点理解态度,多一点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批判。”^①斯诺也曾发出这样的警告:“两种文化

不能或不去进行交流,那是十分危险的。”^②笔者以为,借助小说《星期六》,麦克尤恩喻指了“两种文化”在排他性背后的互补可能。科学与文学犹如贝罗安的家庭,难免会有摩擦,但它们毕竟谁也离不开对方。正如陆建德先生所言:“科学与文化物质的母体须臾不能分离,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科学,甚至还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科学思想的发展方向。”^③科学之于人的肉体犹如文学之于人的精神,二者须臾不可分离。通过《星期六》中的“文化”书写,麦克尤恩为横亘在两大学科之间的“斯诺命题”作出了自己的注解。

Revisiting C. P. Snow: Two Cultures in Ian McEwan's *Saturday*

SHANG Bi-w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As a rejoinder to the current critical view of labeling McEwan's *Saturday* as “9·11” novel, this paper argues that “9·11” attack and its related political concerns are not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the novel. To a large extent, *Saturday* is a novel about the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 of two cultures, namely science represented by a neurosurgeon Henry Perowne, and literature represented by his daughter Daisy. Metaphorically speaking, what science can do to humans' physical world is like what literature can work on their spiritual world. In doing so, McEwan revisits C. P. Snow and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complementarity of two cultures, despite of their seemingly exclusiveness.

Key words: Ian McEwan; C. P. Snow; *Saturday*; two cultures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曾乐:《“两种文化”的困境》,《读书》1988年第4期。

②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5页。

③陆建德:《从C.P.斯诺的〈新人〉看“两种文化”》,《外国文学》1996年第2期。